

水上先民

印尼北蘇拉威西省元軍後裔及石棺遺存考

徐作生 *

摘要 至元三十年夏（1293 年），印尼北蘇拉威西省米那哈撒地區曾經生活着一支蒙元水軍殘部，他們娶土女為妻，結縭生子，繁衍後代，死後被族人葬於石棺（棺內亦間有其土著妻妾和子女）。石棺已知總數 144 座。最可注意者，所有石棺朝向俱朝北方，其寓意先人來自北方的中國；棺上雕刻龍圖騰或太陽等圖騰，帶有顯著的蒙漢文化特徵。而所雕刻之人像，亦具有“面橫闊，顴骨高，鼻稍平”等時代特徵。

關鍵詞 蒙元水軍；爪哇；石棺；龍圖騰；蓮花圖案

一、緣起

2010 年夏，我受邀出席馬六甲首屆國際鄭和學術論壇，會議終了，又用逾 20 個時日，在印尼踏訪古代華人遺蹟。返國時於雅加達機場候機大廳休息，偶遇北蘇拉威西省華人礦主林新順氏，被告曰：“在蘇拉威西島以北的哥打莫巴古市（Kotamobagu）莫達祥鎮（Modayang）達魄谷村（Tobogun），有蒙古人後裔，該族群雖與當地土著共同生活數百年，民族成份歸屬米那哈撒族（Minahasa，註：一譯為米納哈薩，皆同音異譯）之一支，然其身材、面貌頗類蒙古族：皮膚白皙，面橫闊，顴骨高，鼻稍平，而其語言和生活習慣仍保留諸多歷史遺痕。不僅是達魄谷村，在莫達祥所轄的其他小村子亦有此族群。”我驚訝久之而不能語，對曰：“考蒙人在爪哇史，不得不述及元軍征爪哇這件發生在南太平洋地區海戰史上的重大戰役。但元史對此所記寥寥，僅夾雜於《世祖本紀》及《史弼傳》《高興傳》等人物傳記裡，而所記事亦簡略。查《中外海戰大全》¹，述元征爪哇戰役，亦僅數百字。”

林新順氏自言是商人而非學者，“汝欲問有何文字或實物尚可佐證其說，定要到實地查訪，除此也不知其他了。”

然其所言及之，確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學術信息。惜林氏與我並非同一航班，不及細談。末了，彼留下電話和村莊地址（即彼礦所在地），叮囑云“盼緣聚”，始各分袂。

歲月匆匆，一晃八年過去。2018 年 5 月，我藉泗水國立大學孔子學院開設歷史專題講座之機，決定“單飛”萬鴉老，然後再轉僱小汽車，深入北蘇拉威西島北米那哈撒縣下屬村鎮以及哥打莫巴古山區踏勘。

根據實地勘訪所攝之圖片和影像，我對北蘇拉威西島將近 150 座古代石棺及米那哈撒地區一支民族族群的成份進行了詳細而周密的考釋，發現有三：

其一，諸多石棺上反覆出現龍圖騰，以及太陽和蓮花圖案；其二，生活在米那哈撒地區之特殊族群，無論從長相、姓氏抑或是從語言上分析，都帶有蒙元時期所沿襲下來的諸多歷史遺痕；其三，一些刻有 M 字母標識的石棺，為荷蘭文 Mongolië 之縮寫，其落葬年代應在荷據蘇拉威西島之後，即十七世紀晚期。

* 徐作生：上海海事大學鄭和研究中心教授，上海國際友人研究會副會長。

水上先民

從而得出結論：印尼北蘇拉威西省米那哈撒地區曾經生活著一支蒙元水軍，他們（亦間有其土著妻妾和子女）死後被族人葬於石棺，石棺已知總數 144 座，所有石棺朝向俱朝北方，棺上雕刻帶有蒙元文化特徵——龍圖騰或太陽圖騰，一些石棺上的蓮花圖案，表明其中以崇信佛教者為多；而所雕刻之人像，亦具有“面橫闊，顴骨高，鼻稍平”等時代特徵。

茲就石棺內容及元軍後裔文化遺痕一一列出，考證如次，以補文獻之闕如，亦祈讀者不吝匡正。（圖 1）

二、哥打莫巴古地區蒙族成份之踏訪

（一）關於蘇拉威西島米那哈撒地區

為讓讀者諸君了解筆者所踏勘之路線，有必要介紹一下史蹟發現地所處的地理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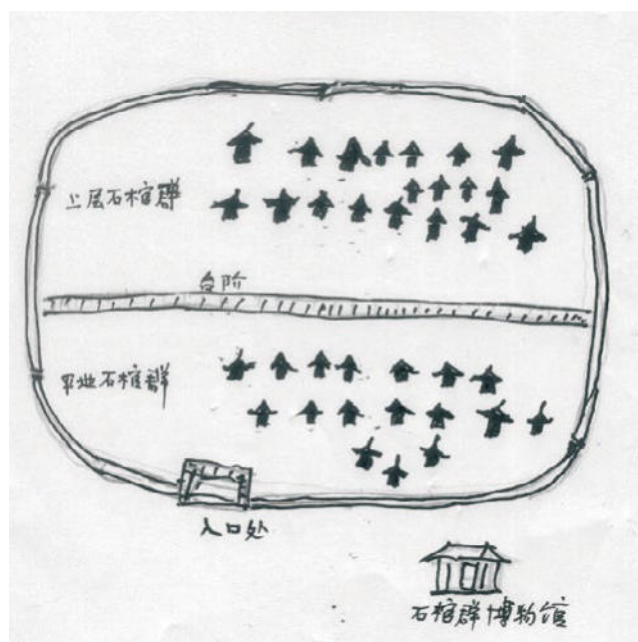


圖 1 · 北蘇拉威西省沙灣岸石棺手繪圖

查《辭海》地理分冊“外國地理”，有蘇拉威西島專條記敘，其文云，“蘇拉威西島（Sulawesi Island），舊釋“西里伯斯島”（Celebes I.）。印度尼西亞島嶼。西隔望加錫海峽同加里曼丹島相望，東鄰馬魯古群島。多高山深谷，少平原，是印尼山地面積比重最大的島嶼。”計分東蘇拉威西、南蘇拉威西、中蘇拉威西和北蘇拉威西這四個省。蘇拉威西島島形奇特，由四座半島分別向東北方、東方、東南方和南方伸出，地圖上看，如同一個四爪掌；其中，北蘇拉威西省即在這四爪之內的北爪——米那哈撒（Minahasa）半島上。

米那哈撒半島，又分北米那哈撒、中米那哈撒、南米那哈撒、東米那哈撒四縣，其中還要加上北蘇拉威西省省會萬鴉老市。如果粗分一下，世代生活在這裡的土著居民屬米那哈撒族，他們多信仰基督教（約佔 60% 以上），亦有不足 30% 的人信仰伊斯蘭教和萬物有靈教。

（二）莫達律鎮杜嵩村（Duson）原住民調查

時間：2018 年 5 月 13 日

地點：哥打莫巴古市莫達律鎮杜嵩村

受訪者：原住民

按照八年前華人礦主林新順先生所留下的通訊方式，打電話一直聯絡不上，詢之他人，才知印尼實行電話實名制，老號碼一律廢止使用。

承蒙北蘇拉威西省華文教育協調機構主席徐啟忠先生想得周到，為解決語言交流障礙問題，選派萬鴉老華校的一名米那哈撒族女學生妮婭為我做隨同翻譯。

水上先民

若去哥打莫巴古市（Kotamobagu）莫達佯鎮（Modayang），必得要從萬鴉老僱車前往，兩地之間雖距離兩百多公里，唯因沿路彈坑累累，崎嶇不平，司機曰，跑一次單趟，至少要花四、五個小時，來回在路上時間就要十個鐘點以上。

清晨 7 時許在集合地出發時，妮婭手中提着早餐尚未及吃，車行期間，又因顛簸劇烈，彼嘔吐不已，可以想見旅途之艱險。

我們到達莫達佯鎮時已經是晌午時分，立即找一家餐館吃飯，其間通過飯舖老闆介紹，找到了鎮長家，不巧未遇。遂驅車上路，在一個叫杜嵩（Duson）的小村莊停下，村口有小店，詢店主，答曰姓黃，其父黃公梵，是華裔，英文名 Huang Kongfan，上世紀中期始遷徙至此，父親已經去世，留下這片小店舖由他打理。這家華裔顯然非原住民。我們之間交談過程中，其對這一帶歷史亦不甚了了。

於是妮婭帶路，繼向村子深處走，這裡全是陡坡，芭蕉林子茂密，木板搭建的民宅散落在陡坡之下。



圖 2・杜嵩村原住民約瑟夫 - 阿卜杜拉曼父子在訪問者踏勘筆錄上簽名

關於原住民之姓氏調查：

尋找到一家屋宇較大的宅子，主人是個中年漢子，41 歲，叫里吉（Ligi），長相憨厚，妮婭向他說明來意，主人便和善地請我們入屋作客。

這是一個大家庭，屋裡還有里吉的奶奶、父母、弟弟、弟媳，以及里吉的妻子和一雙兒女，若加上搖籃裡的侄兒，總共有九口人。（圖 2）

里吉的父親叫約瑟夫 - 阿卜杜拉曼（Yosuf-Abdulrahman），據其所言，他們世代居住於此，是這個村莊裡最古老的原住民，他有兩房兒子，還有一個已出嫁的女兒。從“Abdulrahman”這個姓氏來判斷，他們信仰伊斯蘭教。約瑟夫 - 阿卜杜拉曼告曰，杜嵩（Duson）村內，除去外來雜姓不算，共計有九個姓氏，這九個姓氏裡，竟然有五個是以“蒙古”（蒙古或讀如蒙哥）打頭的，如下列：

原文	轉為漢語讀音
Mokoagow	蒙古阿公
Mokoapa	蒙古阿巴
Mokoginta	蒙古京打
Mokodonpit	蒙古董兵
Mokodongan	蒙古董岸
Mamonto	媽孟托
Paputugan	巴布托岸
Gumalangit	哥媽拉衣特
Abdulrahman	阿卜杜拉曼

關於原住民之語言調查：

繼之，我請約瑟夫把一些自然現象、人的器官、動物以及日常生活用具等當地語言（很隨意性地舉出 23 個單詞）一一列出，並且把這些語言與爪哇語和米那哈撒語又一進行比對，最後得出結論，所列出的 23 個單詞之中（包括一個動賓

結構的短語詞組“吃飯”），有 16 個是與爪哇語或米那哈撒語迥異。

鑑於語言發展規律之變化，若外來詞彙逐漸增加，同源詞彙逐漸分離，並且出現語義擴大縮小等現象，外來詞彙甚至可以影響一個語言的語法過程，這裡所述之 23 個名詞，一律按照“原生態”情狀呈於讀者諸君眼前，而不作探究。

分列如次：

名詞	原文書寫	漢語讀音	爪哇語和米那哈撒語
狼	Briy	博銳耶	不同
馬	Kapalo	嘎巴咯	不同
牛	Sabi	薩碧	類似
羊	Baimbe	拜母拜	不同
狗	Ungku	翁姑	不同
人	Itau	衣滔	類似
眼睛	Mata	媽他	類似
手	Limah	黎馬	不同
嘴	Bibik	必必克	不同
腳	Siol	絲敖	不同
臉	Pogot	報告	不同
牙齒	Bagang	巴綱	不同
太陽	Singgai	新概	不同
月亮	Buran	部然	類似
草原	Bonok	波瑙克	類似
大山	Bulud	布路得	不同
動物	Tundi	蹲地	不同
吃飯	Mongan	磨岸	不同
菜	Pindan	賓丹	類似
勺子	Leper	勒潑	類似
馬奶	Susu	素素	類似
樹	Bangkoi	棒告衣	不同
房子	Baloi	巴勞衣	不同

八年前偶遇華人礦主林新順氏，謂莫達洋鎮（Modayang）達魄谷村（Tobogun），有蒙古

人後裔，長相特徵頰大顴高，鼻平唇厚，頭面圓，特別是他們使用的農具和其他的生活用具還保留着古風遺存，可是因天色漸晚，而遍訪達魄谷村（Tobogun）無果，故此次調查亦僅能到此為止，俟日後有機緣再作踏訪。

但是，令我驚異的是這五個具有一定規律的“蒙古”姓氏：Mokoagow 蒙古阿公、Mokoapa 蒙古阿巴、Mokoginta 蒙古京打、Mokodonpit 蒙古董兵、Mokodongan 蒙古董岸。那麼這個一定的規律之中，又蘊含着怎樣的歷史信息呢？

另外，據村莊裡的其他長老告云，這五個姓氏中的“蒙古”之稱號，在莫達洋鎮（Modayang）一帶的其他村莊也有，更或攀染至附近他鎮。比如在莫達洋鎮往北約 25 公里的地方，就有一個叫蒙古幫（Mokobang）的村寨（見圖 1 上的標示，屬 Tompasubaru 鎮管轄），村人多以蒙古（Moko）為姓氏，便可來佐證此種情狀。

這一支特殊的土著族群到底來自何方？他們說的語言與其他的部落民族為何又有太多的不同？他們的祖先是哪一個朝代流落到此的？

（三）蒙元水軍征伐爪哇之因果

如開篇所言，要考述蒙族成份這種種的疑問，我們不得不提到歷史上的蒙元水軍征伐爪哇這個重大歷史事件。

在十三世紀時，曾經出現過由蒙元帝國維持了一個世紀之久的“世界體系”，元代的疆域“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中國同歐洲、中亞、東南亞的交通極其便利，中外交往非常活躍。當時與中國有海外貿易關係的地區和國家很多，海道貿易方面，據元人汪大淵《島

水上先民

夷志略》²的記載，僅東南亞、南亞各沿海國家和地區即達 97 個之多。《元史》中說，元世祖忽必烈誥諭海外國家“誠能來朝，朕將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

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二月，受忽必烈遣派，右丞相³孟珙持詔書來到爪哇王宮，勸說國王來華朝貢，時因言語不合，孟珙被國王黥面放還。

外交無小事。《元史·世祖本紀》云，忽必烈聞報後震驚，即命史弼、高興、亦黑迷失作統領，調集福建、江西、湖廣三地兵士兩萬人，⁴戰船大小 500 艘，攜載供水軍一年的糧食，渡海遠征爪哇。

又，若按《元文類》記載，則“發舟千艘，費鈔四萬定，資一年糧，降虎符十、金符四十、銀符百，金衣段百端備賞。”⁵《元史》在寫到這段外交史實時，記載了忽必烈的一段話，他說：“卿等至爪哇，明告其國軍民，朝廷初與爪哇通使往來交好，後刺詔使孟右丞之面，以此進討。”⁶說明忽必烈本來欲和爪哇國正常往來，但卻發生了孟珙被黥面之事，故而元朝不得不興師問罪。

元朝廷為了擴充征伐爪哇水軍的招募，下詔凡是“習泛海者，募手工千人者為千戶，百人者為百戶”，⁷而且還實行了“罷開河之役”及“令販私鹽軍習海道者為水工”兩項政策，以保證招募到水軍所需要達到的人數。

關於元軍征伐爪哇的航線圖，《元史·史弼傳》裡講到：元軍過七洲洋、萬里石塘，歷交趾、占城界，明年正月，至東董、西董山、牛崎嶼，入混沌洋橄欖嶼，假里馬答、勾欄等山，駐兵伐木，造小舟以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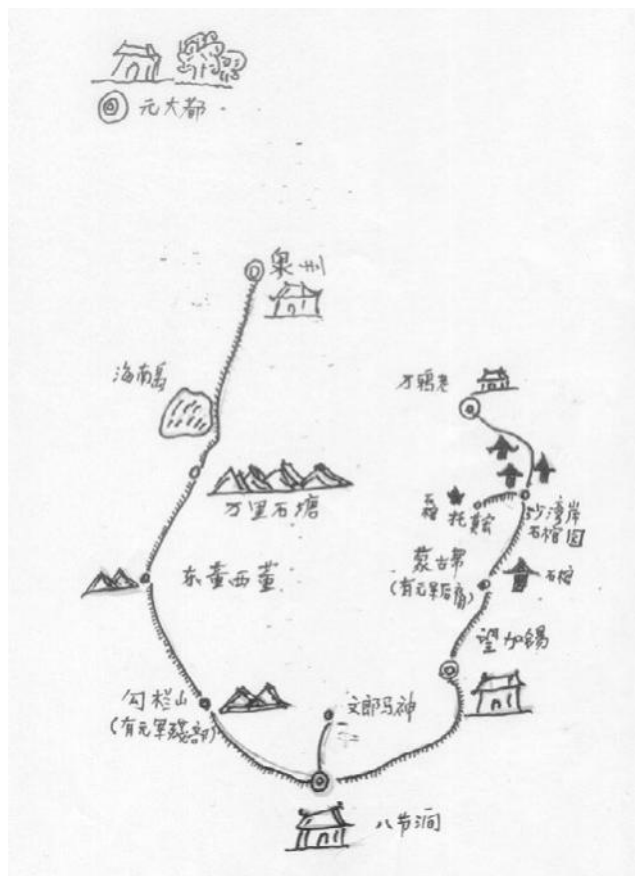


圖 3·元軍征爪哇航線圖

根據上述史料記載，元軍經過的線路是：七洲洋，即今七洲群島東南洋面；萬里石塘，即今西沙群島；混沌洋，今占婆島東南洋面；東董、西董山，即今藩切市東南；橄欖嶼，今頭頓市西南崑崙島；崑崙洋，即今崑崙島以南洋面；牛崎嶼，今關丹市東南離門島；假里馬答，今坤甸市西南卡里馬塔島；勾欄山，即加里曼丹島西南岸一屬島，英文 Gelam⁸。（圖 3）

元軍征爪哇一戰，因指揮失利，傷亡三千人，餘部在海上漂泊 68 天才回到泉州。但是實際情況，除去在沿途島嶼一路滯留的病卒，返回的水軍人數不多。於是，忽必烈詔治史弼、亦黑迷失這兩名指揮官的罪過，各廷杖之，沒收他們的三分之一家產。

這裡提一句，忽必烈時期與爪哇國的關係除去至元二十九年、三十年處於戰爭狀態以外，其餘時間都保持着友好的往來。如至元十九年七月，宣慰使孟慶元、萬戶孫勝夫使爪哇回，閩婆國貢金佛塔。周致中《異域志·爪哇國》說：“古閩婆國也，自泉州發舶，一月可到……與中國為商，往來不絕。”又據《馬可波羅行紀》之《爪哇島》記載：這個國家商品種類很豐富。島上出產如胡椒、肉豆蔻、甘松香油、生薑、萆澄茄、丁香和其他一切有價值的香料和藥材，因此有許多商船裝載商品前來交換，並且獲得巨大的利潤。這些記載充分說明了元朝與爪哇的貿易往來是十分頻繁的。

有個細節：元朝水軍在爪哇之戰中，有一些殘部就留駐在當地不走了。如經過勾欄山（其地今屬印尼）的時候，把部分病卒留在了那裡，與當地人雜處，過着很悠閒的生活，元人汪大淵見到他們時（這些人亦有可能是水軍後代），用“飄然長往”一詞來形容。汪大淵《島夷志略》云：“飄然長往，有病卒百餘人，不能去者，遂留山中。今唐人與番人叢雜而居之。”⁹ 唐人，即中國人。其實，汪大淵在航行途中，不僅在勾欄山親眼見到過蒙元水軍或他們的後代，還在中東的馬魯潤¹⁰見到過一名當地的酋長，一交談，對方告訴說姓陳，河南臨漳人。幼小時能讀書，長大後又習練兵事。元初曾經在甘州做官，後來率領所部西征，到了這裡之後便沒有再回去。由是觀之，元朝無論是東征還是南征，都有可能留下一些殘部在那裡¹¹，至若時光推移之下，子孫繁衍，人丁興旺。

綜合以上史料，筆者可以斷言，印尼北蘇拉威西省米那哈撒地區曾經生活着一支蒙元水軍殘部，他們與生活在勾欄山的水軍一樣，“飄然長往……不能去者，遂留山中。今唐人與番人叢雜而居之”，並因此留下了後代。

行筆至此，筆者又發問：流落在北蘇拉威西的蒙元水軍，其間又有着怎樣的滄桑經歷呢？除此能否尋找到更直接或讓人信服的文化遺存呢？

三、北米那哈撒縣沙灣岸石櫛群勘查

時間：2018年5月14日

踏勘地點：北米那哈撒縣沙灣岸（圖4）

地理位置：北緯1.4度；東經125度

當地嚮導：北蘇拉威西省華文教育協調機構主席徐啟忠

沙灣岸石棺群管理處解說員：Ferni-Kalalo

北米那哈撒縣地處蘇拉威西島最北端，石棺群所在地的沙灣岸村，距離萬鴉老以東偏南25公里處，地理位置是北緯1.4度；東經125度。

石棺群排列呈上、下兩層，上層是一座高約30厘米的平台；下層則是在地面之上。上下兩層的石棺數總計144座。石棺群總體俱



圖4·北米那哈撒縣沙灣岸石棺群所在地樹立之標識

水上先民

朝向北方。每座棺上有“屋簷”：由兩片石板鑲合成“人”字形狀，將石棺蓋住，密封度很高。石棺呈長方形，形制基本統一，但在規格上也互有差異，殮裝孩童的石棺高約一米，而最大的一座高約 1.96 米。一般多為一人一棺，亦有一棺三人的（詳考見以下的圖像釋讀）。

據石棺葬區管理員工介紹，這片石棺葬區，上層台階的石棺年代最久遠，而地面上的石棺其安葬年代則稍晚。躺在的石棺裡的主人都是部落長官，或其後代，總計有 144 座。

葬區外牆牆壁，有當代人所作的立體壁畫，其材質似用水泥，內容敘述石棺製作之過程，以及人在亡故之後，被遺族安葬之過程。

筆者考曰，由於沒有確切史料來佐證，因此這些過程，多是經過開棺之後，根據屍骨的實際情況來進行描述的。為我做講解員的是 Ferni-Kalalo 女士，今年 31 歲，圓臉，唇厚，鼻稍平，膚色較白，米那哈撒族人。她告訴我，她的姓 Kalalo（讀如“加拉若”），亦蒙古人姓氏，沙灣岸村土人，這是她小時候長輩就告訴她的。



圖 5 · 作者在沙灣岸古墓群

又據其曰，這裡的石棺，大多數是原址上的，亦有少部分是從其他村莊遷移過來的。北蘇拉威西省文化部目前還在該省的其他一些農村發現一批散落的石棺，皆為古蹟，所以統觀起來，總數大約要超出現在的數字（總計約三百四十餘座）。關於石棺的年代，有說距今八百多年的，但也有說一千六百多年的，口徑不一，目前印尼學術界尚未對其作出權威的考證和評價。位於石棺群外牆，有一座規模甚小的博物館，裡面展覽品很少，據介紹，石棺裡陪葬品多被盜走，目前館藏僅有幾件青花瓷器和青銅短劍。管理員說，由於人手少，制度鬆懈，這些藏品早晚也難逃被盜之噩運。（圖 5）

（一）石棺圖像釋讀之一：石棺群分組排列，整齊有序，每座俱北向

這種葬制與米那哈撒地區其他民族的喪葬方式完全不同。2010 年夏，我在東爪哇之泗水和日惹兩地踏勘，曾經訪查過當地的一些墓葬（當地土著墓葬和寺廟的華人墓區），均未見過此種豎立如屋的石棺。

又考元代墓葬，在中國內地有無發現石棺的考古記錄呢？回答是肯定的。因限於篇幅，這裡僅舉兩例，不展開內容，以窺一斑。

例一：1975 年 6 月至 8 月，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在大青山以北進行古文化遺蹟調查時，於紅格兒地區的宮胡洞、烏蘭湖洞以及潮魯溫克欽三地發現了石頭墓和石板墓，間或亦有石棺，這些古蹟的時間跨度從隋、唐到金、元。¹²

例二：1975 年 5 月至 6 月，黑龍江省博物館考古人員與哈爾濱師範學院歷史系學生聯合組成文物普查隊，到內蒙古新巴爾虎右旗進行田野調查，在達石莫鄉東南約 15 公里的哈烏拉山發現一

水上先民

處規模宏大的石板墓群，計分東墓區和西墓區，墓葬分組排列，整齊有序。關於該石板墓（間有石棺）族屬，俄羅斯外貝爾加地區和蒙古東部地區（也就是古籍中述及的漠北地區）墓中出土的人骨經鑑定，具有明顯的蒙古人種特徵，哈烏拉山石板墓屬北方草原地帶的遊牧民族是可以肯定的。¹³

以此比照北米那哈撒縣沙灣岸石棺群，該石棺群亦分組排列，整齊有序。但是有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就是它們總體俱朝向北方。對於這一特殊現象，至今仍然無人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

余考證石棺群整體朝向北方這一特殊現象，“即彼等靈魂所詣之地也”¹⁴，其寓意一如南宋攢宮。南宋攢宮，即宋六陵也。顧炎武說：“昔宋之南渡，會稽諸陵皆曰攢宮，實陵而名不以陵。”攢宮，暫厝之棺廓，昭示死後亦不忘祖先來自中原。（圖6）

古代草原遊牧民族為何會使用石棺作為墓葬呢？筆者在學界曾看到一種觀點，認為他們之所以用石板為墓，蓋因木材缺乏，大自然生態制約所致。但是，遠在萬里之外的印尼蘇拉威西島，森林繁茂，木材取之不盡，那又為何不用木棺而採用石棺呢？故回到原話題，只有一種解釋：石棺的主人及其後代均承襲了祖制。



圖6·沙灣岸古墓群分組排列，整齊有序，每座石棺都朝向北方

水上先民

（二）石棺圖像釋讀之二：人物造像及衣飾、冠冕特徵

來釋讀此處取兩個不同面部表情的人物。（圖 7、圖 8）

見圖 7：人物造型有三大特徵，頰大顴高，鼻平唇厚，頭面圓。着對襟衣，凹後領，這件對襟衣，不但袖口肥大，且下擺也較肥大。對襟上無繫帶，收腰。雙腳蹬靴。人物雙手叉於腰間，嘴微微抵起，瞠目，發怒，似武士。人物頭頂上的帽子（冠冕）以及兩掌均遭到毀損。

見圖 8：人物造型頗類圖 7，即頭面圓，頰大顴高，鼻平唇厚，唯面部表情不同，雙目平視，臉微露笑容。坐姿，雙腿稍彎曲，亦雙腳蹬靴。



圖 7・人物着對襟衣，雙手叉於腰間，嘴微微抵起，瞠目，臉部表情威武，雙足蹬靴，似武士

此幅圖像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頭上戴着三齒形冠冕。而此種三齒形冠冕，下面將要展示的（圖 9）之中我們還可佐證這個人物特徵。

關於對襟衣和三齒形冠冕。

首先關於無扣對襟衣。我們會生出一個疑竇：蒙古族的傳統服飾是蒙古袍。其服右衽，無領，衣肥大，長拖地。以紅、紫等色綢緞帶緊束腰部。既然如此，那麼這種對襟衣就不會出現在具有蒙元文化的石棺中。

“但是，反觀當時的歷史情況，在酷熱的赤道線附近，若是穿着袍子打仗，反而有違歷史事實。”（筆者 2018 年 6 月 5 日拜教於內蒙古博物院陳永志院長，引號裡的話語即陳院長所言。）



圖 8・雙目平視，臉微露笑容，坐姿，雙腿稍彎曲，着圓領對襟衣

水上先民

再之，在水軍之中，南方人佔比九成以上（福建、江西、湖廣三地），他們有流行漢服的習慣。

不僅如此，此種衣飾我曾在內蒙古博物院三樓的蒙元展覽廳裡見到過真品（圖 9）。這件對襟衣保存完好，絳紅色，無領，中短袖口，面料上綴有乳黃色花案，色彩柔和而素雅。忽必烈入主中原，在服裝文化上吸取了漢文化的特色，即便在蒙古族聚居的大草原，亦有上層貴婦穿起了漢服對襟衣。

又，根據沙灣岸石棺群古蹟園區講解員 Ferni-Kalalo 介紹，這裡的石棺造像均取自於逝者生前的現象，而我們若從其姿態和形狀來看，可以讀出他們活着時的場景，那是絕不同於一般庶人的生活。考石棺畫上的人物，有數次出現三齒形冠冕。（圖 10、圖 11、圖 14）再看圖 10 之中的人物，是一位臉上留着髯鬚的耄耋長者，他戴的就是三齒冕，此種帽子亦非普通百姓之冠冕，說明逝者的官銜級別很高。而通過他兩腮的濃鬚，可以判斷這是一位典型的穆斯林教徒。他的身份可能是“怯里馬赤”，意為“通事”，也就是今天說的翻譯官。蒙元征服各國，言談多借助通事。



圖 9 · 元代的對襟衣（內蒙古博物院蒙元文化展覽廳陳列）

水上先民



圖 10・留着髯鬚的長者

元朝官衙多設立怯里馬赤，以便於在異域的語言溝通。

關於三齒冕，我們可以從“窩闊台加冕禮”圖像¹⁵（圖 11）和“阿八哈汗和他的子孫”¹⁶圖像中（圖 12）得到印證。這兩幅圖像中，窩闊台和阿八哈汗所戴的冠冕皆為三齒形。而在赤道上的萬島之國印尼，無論古今，皆未見戴帽者，更遑論三齒形冠冕。

關於戴帽與土人“布纏頭”之區別。

需要釐清的是，在古代的爪哇及其附屬小國，亦有以布纏頭的風俗。比如，《明史》中說，文郎馬神國（此小國故址在今印尼加里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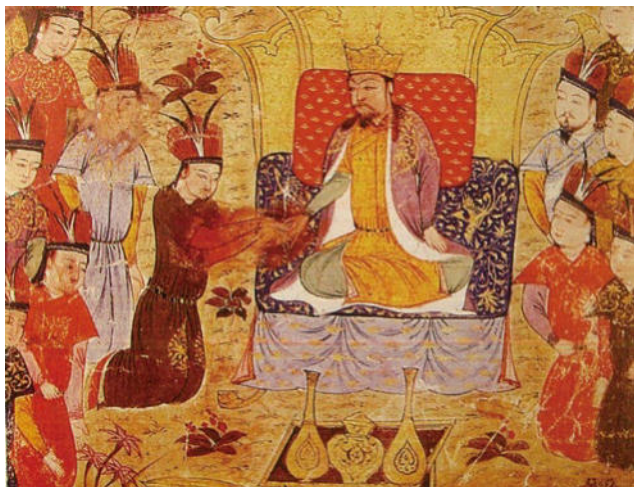


圖 11・窩闊台加冕禮



圖 12・阿八哈汗和他的子孫



圖 13・纏頭裸乳之土女歌舞圖

水上先民

丹的最南端馬辰，鄰近蘇拉威西島。印尼文 Banjarmasin，讀如班加爾馬辛），“男女用五色布纏頭，腹背多袒，或着小袖衣，蒙頭而入，下體圍以幔。”用布纏頭，腹背多袒，我在仔細勘查所有的石棺過後，此種畫面確實出現過，（圖 13、圖 14）如圖 13，不過畫面中的人物，其下巴尖，有兩巨乳，未穿衣，頭纏布，布條有一端從左耳旁拖曳而下。人物呈半蹲姿態，手舞足蹈，碧玉年華，這是當地一個典型的土著裸女，其特徵逗人奇趣。以此纏頭旁有布條拖曳之形式，再逐一比照前所言及的戴冠冕者，兩者毫無共同之處。

另外，生活於 1203-1283 年的卡茲維尼（Kazwini）寫過《世界奇異物與珍品志》，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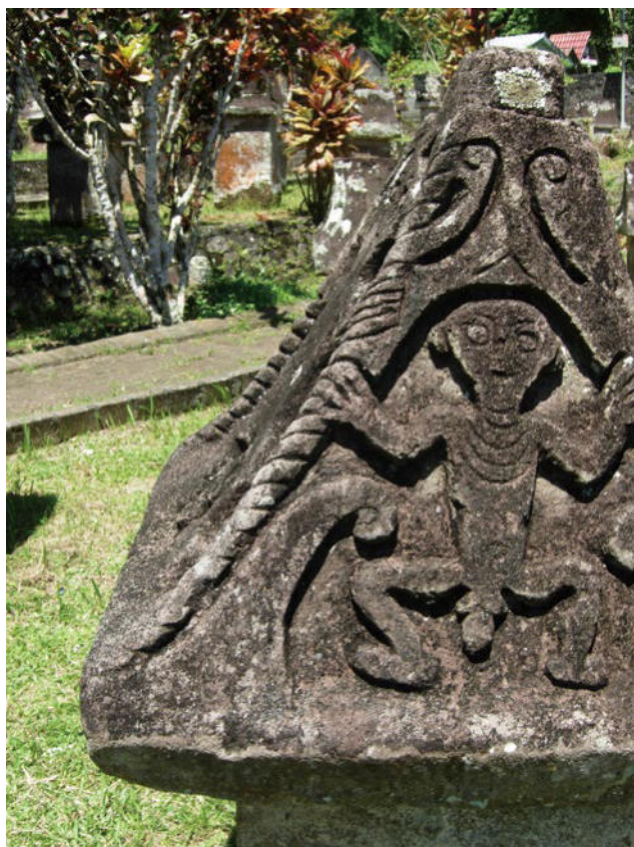


圖 14· 小男童，項頸上戴飾物，圍肚兜，考其骨骼，6 歲夭

中有一段講述到他在南洋旅行時看到女兒國的奇聞：瓦克瓦克群島（Wakwak）與爪哇近，人們發現那裡均為女子，絕無男子的蹤影。姑娘們靠風或吃水果受孕，生下來的也是與她們一樣的女子。學術界有人考訂其地為今蘇拉威西島布吉斯人（Bugis）居住地，在古代，該民族女權甚大。或可認為圖 13 的土女，即部落頭領也。¹⁷

（三）石棺圖像釋讀之三：昭示不同人種的婚配

見圖 15，這幅圖面上，共有三個人物造像：一個主角立於中央，另外兩人用面龐來替代。主角刻工極為精細，雙目炯炯，鼻子細巧，嘴巴微啟，下巴渾圓。無論是其五官，還是其服飾，都可用英俊帥氣來形容。尤其是雙手的刻畫，拇指叉開，其餘四指併攏，指縫所用的線條，紋理清晰而柔美。而其身上所穿的對襟服飾，設計得繁複與靚麗，幾乎臻於完美。這幅圖片，我在 2018 年 6 月 5 日專程赴呼和浩特，向內蒙古博物院陳永志院長請教，他用手指着這張圖上有兩個尖下巴的人面，一語點出了要害。陳永志曰：“蒙元時期純種的蒙古人，他們的臉龐不會是這樣尖尖的。”

為甚麼同一幅圖片之上，會出現“一圓二尖”的滑稽事情？白而言之，為甚麼主角（我們暫且這樣表述）和配角會有不一樣人種的面孔呢？帶着疑問，我從蒙元水軍征伐爪哇的歷史狀況去思考，找出答案。

元軍征伐爪哇，史書上沒有出現過攜帶家眷的記錄。這是因為元軍專為打仗而來的，如果攜帶眷屬會有諸多麻煩。可是，一旦流寓島國，繁衍子孫，他們的配偶就肯定是當地土著無疑，一若逗留在勾欄山的水軍“飄然長往”。又舉一細例：前面說過的文郎馬神（此小國故址在今加里

水上先民

曼丹的最南端馬辰，Banjarmasin，讀如班加爾馬辛），中國的水手上岸，“女或悅之，持香蕉、甘蔗、茉莉相贈遺，多與之調笑。”香蕉、甘蔗，皆寓意男性生殖器也。若女與華人通，被父母發覺，輒削其髮，以女配之，永不聽歸。女苦髮短，問華人何以致長，給之曰：“我用華水沐之，故長耳。”其女信之，競市船中水以沐。華人故斬（奚落）之，以為笑端。按照當地的浪漫風俗，一些好客的男主人希望自己的妻子擁有一個中國情人，這樣可以使他感到非常體面。華人商船的到來，除了刺激當地貿易和香料種植業的發展，也促成了色情業的繁華。船員們與當地多情的女子結下了深厚友誼，同時也播下了他們的種子。在經歷了多次浪漫愛情之後，一些人在南洋滯留不歸，並且留下了後代。



圖 15・此幅圖像，人物面龐“一圓二尖”

所以，我們若再回頭探討為甚麼同一幅石棺圖片之上，會出現“一圓二尖”的滑稽事情，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圖 16）

（四）從人物雙眼的繪畫看謎底

石棺群的人物造像，每個人物的眼睛之描繪，皆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用雙圓圈來表示。圖 10、圖 14，一如現在兒童的卡通畫，疑卡通人物之雙目即取材古人也。如上舉例的幾幅，此再舉一幅，見圖 17，雖為土人女性（或元人之妻）特徵：尖下巴，布纏頭，腦後披巾，但眼睛之描繪，乃雙圈。

此種繪畫手法，我讀過《內蒙古岩畫的文化解讀》¹⁸，該書第 36 組圖、圖 877 裡出現的雙目，其藝術手法也是同出一轍。該岩畫在位於小徠殆溝的岩面上。

考曰，雖然內蒙古小徠殆溝的岩面與北米那哈撒縣沙灣岸石棺群年代不同，但是它們所傳承的藝術表現手法卻是“同宗同源”，這一點無可否認。

（五）石棺圖像釋讀之四：圖騰主題是龍

在現場踏勘時，還有一個“群體”圖案引起我的極大興趣，那便是有關龍的圖案在許多石棺畫面上的反覆出現，成為一種圖騰。這些龍圖騰刻工粗樸而生動，而不同的石棺上，龍圖騰表現出來的雕刻技藝亦略有變化，給人以栩栩如生之感。

而且這種龍，常常是單一或多個出現在一座石棺圖畫中，我還勘察到有一石棺上的龍，竟然有四條之多，它們是由四個龍頭拼合而成！見組圖 18，在這六幅圖畫上，我們可以看到各種形狀

水上先民

的龍，“龍身短，無足”是它們的共同特點。再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它們有一個不可忽視的細節，那就是：這些龍的造像形態各異，它們均有角，其中，還有兩條龍長着翅羽，即有翼龍也。

為甚麼龍有角？歷史上的龍圖騰，大多有角，郭璞《山海經圖贊》云：“龍魚一角，……飛驚九域，乘雲上升。”¹⁹而學術界關於龍角，大抵亦形成這一見解，龍頭上的角與鳳凰上的冠，都是在形象上的同一個意義。

元代後期的龍，其頸細、唇長，在細節上更為具體。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此組圖畫中得到印證：每條龍，其嘴唇都很長，誇張而有韻動感，這也形成了“石棺龍”（我們姑妄稱之）的主要特徵。

聞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一文中，認為龍圖騰在中國歷史上佔據絕對主導地位的演變過程，繹述了作為圖騰的龍怎樣蛻變為華夏始祖的一種圖騰主義的中華民族心理。可以說，龍是中國文化的象徵。凡有中國人的地方，或凡受中國文化薰陶的地方，都有龍的蹤跡。



圖 16・作者在文郎馬神國故地踏勘，與慈聖宮主席張和宣老先生合影



圖 17・土人女性（或元人之妻）特徵

或質疑曰，既然石棺有蒙元人的文化元素，而蒙古族圖騰是狼或其他猛獸，這又如何解釋？毋庸置疑，對於蒙古民族的祖源傳說，《元朝秘史》²⁰開宗明義，是從蒼狼白鹿開始的。筆者就此在呼和浩特請教過內蒙古博物院陳永志院長，陳院長告曰：“我是蒙古族出身，蒙古人崇尚猛獸，一如天上的老鷹，地上的蒼狼，是有其道理的。”然而，亦有一個考古發現可以佐證，在內蒙古赤峰市紅山文化遺址，發現距今五千年前的碧玉龍，它已被中國文物界公認為“中華第一龍”。赤峰市也因此被譽為“中華玉龍之鄉”。

又，忽必烈入主中原後，也接受並融合了漢文化，包括龍圖騰。今天我們依然可以在許多蒙元時期的皇家園林可以看到這種龍圖騰現象。

水上先民



圖 18・龍圖騰（之一）



圖 18・龍圖騰（之二）：四龍合一



圖 18・龍圖騰（之三）：舞動的雙龍

或又質疑云，龍圖騰只有皇帝的宮殿和陵寢才可以使用，以表示天子上授天意、主宰一切的威權。那麼，這些遠在域外的石棺為甚麼要使用龍圖騰呢？其實這也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它們是域外的華人思念故土卻不能歸葬故土而留下的文化印記。有相同的例子：筆者 2010 年

元月，在菲律賓蘇祿西王府達威達威省（Tawi-Tawi）的孟皋（Bongao），踏勘明朝鄭和下西洋軍士本頭公廟和祀祠，在大殿的門外，設有三足香爐，爐壁四周，環雕雙龍噴火之圖案²¹。而且，從地理位置上看，菲律賓的達威達威與印尼的北蘇拉威西島僅隔一條蘇拉威西海峽。



圖 18・龍圖騰（之四）：有翼龍



圖 18・龍圖騰（之五）：從已經漫漶的龍頭可考，此座石棺年代最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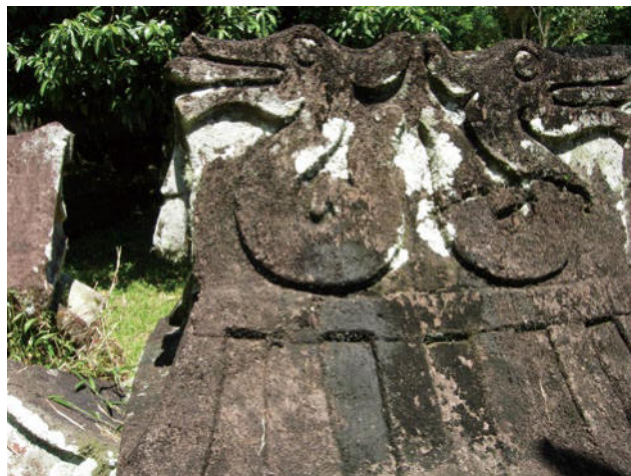


圖 18・龍圖騰（之六）：刻工樸拙，造型生動

另外，除了龍的題材而外，石棺群裡還逐一發現有太陽和蓮花的圖案（圖 19）。太陽之造型，其上光芒若齒輪狀放射。蓋山林《內蒙古岩畫的文化解讀》第 303 頁有記，在內蒙古赤峰市黃金河流域神格面具岩畫中，一些具有太陽特徵的岩畫，“即有光芒線者，不僅數量多，形象也較大。”

至於蓮花，則是漢民族崇信佛教之圖案。石棺上蓮花圖，呈四瓣狀開放，四大瓣之間，又有小瓣若干陪襯，給人以強烈的立體感。可以說，龍、太陽和蓮花，這三樣反覆出現的圖案，是構成石棺群蒙漢文化的主題。爪哇諸土著圖騰，皆無類似者也。²²

（六）關於沙灣岸石槨群之年代

關於沙灣石棺群之年代，寫下這個標題，頗難考釋。這是因為，遍覽群棺，其上根本找不到具體年代的記錄。

那麼，可否從石棺畫中尋找到蛛絲馬跡，用以證實其年代的印痕呢？

水上先民

在一座具有蒙古人特徵的石棺畫面上，有戳紋印記（圖 20），戳紋為六個菱形狀，呈連續性排列，位於該石棺“片瓦”之右側。此種幾何圖案組成的戳紋印記，筆者曾在內蒙古博物院的蒙元年代展廳裡看到過相似的圖案。再者，相關的蒙古族文物，我看到《呼倫貝爾民族文物考古大系——新巴爾虎左旗卷》一書，“遼代陶器”章節，有此類似戳紋陶器片數枚，其圖片說明是：“腹部有刻劃的雙凹弦紋和三角紋。”²³

通過仔細勘查，還在石棺上發現一個顯示出文化特徵上的重要細節，即墓主年代稍晚者，還刻有大寫的 M 字母，而早期的石棺則有戳紋而無此字母標識。

蒙文甚難描摹，早期流寓在此的元軍，多為漢人，他們不識蒙文，但亦不會標識“M”，原因很簡單，“蒙古”一詞最早出現在印尼的古碑中，應為荷蘭文“Mongolië”，概在明末始出現也²⁴。1512 年，一心想壟斷香料貿易的葡萄牙人來到這裡，1607 年荷蘭人在望加錫（Kota Makassar，為印度尼西亞南蘇拉威西省的首府，亦是蘇拉威西島上最大的城市）建起殖民點，嗣後荷蘭的勢力在島內逐漸擴展。故筆者勘定，這座刻有大寫的 M 字母的石棺，墓主落葬年代應在十六世紀初。（圖 21）

四、結語

綜合以上的踏勘和考證，發現有三。

其一，諸多石棺上反復出現了龍圖騰，以及太陽和蓮花圖案；

其二，生活在米那哈撒地區之特殊族群，無論從姓氏抑或是從語言上分析，都帶有蒙元時期所沿襲下來的諸多歷史遺痕；

其三，一些刻有 M 字母標識的石棺，為荷蘭文對“蒙古”名詞之縮略，其落葬年代應在荷據蘇拉威西島之後，即十六世紀初。

論曰：至元三十年夏（1293 年），印尼北蘇拉威西省米那哈撒地區曾經生活着一支蒙元水軍殘部，他們娶土女為妻，結縭生子，繁衍後代，死後被族人葬於石棺（棺內亦間有其土著妻妾和子女）。石棺已知總數 144 座。最可注意者，所有石棺朝向俱朝北方，其寓意先人來自北方的中國；棺上雕刻龍圖騰或太陽等圖騰，帶有顯著的蒙漢文化特徵。而所雕刻之人像，亦具有“面橫闊，顴骨高，鼻稍平”等時代特徵。

附記：

關於南海區域所在國古代水軍之研究，在海內外學術界一直乏人問津，屬弱項。1919 年，法國學者費琅著《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於“爪哇吉蔑占波中國之海軍”一章中，開篇就指出：“此種南海土著海軍問題，雖甚重要，然據予所知，尚無人研究及此。”²⁵ 陸峻嶺在該書的“補註”中亦說：“古代南海史地之學，包括範圍廣大……中西典籍，向無專書記載。欲求得正確之考證，非有宏博學識，不足辯此。”今筆者以淺薄之學，敢不揣鄙陋，亦望學界同仁指謬。

此篇拙文撰寫甚艱，時間跨度亦長。若從 2010 年林新順先生告知第一線索算起，到之後不斷翻檢文獻資料，並赴實地進行調查，釐清歷史真相，其間整整經歷了八個年頭。以“八年磨一文”喻之，一點不為過也。

首先要感恩中國科學院院士、我國造船科技發展史研究之奠基人楊標教授，他在期頤之年（101 歲），作為拙文的第一位讀者審閱並寫下

水上先民



圖 19・雲龍蓮花圖



圖 20・石棺上有戳紋印記



圖 21・刻有大寫的 M 字母的石棺，墓主落葬年代勘定在十六世紀初

了如此高的評語：“這是學術界首次發現爪哇水軍的考察。通讀了一遍，十分佩服徐作生同志為查究此事所付出的艱巨勞動。”

我在實地踏勘之時日，適泗水連續發生恐襲之際。感謝泗水大學孔子學院院長肖任飛教授在我隻身飛赴萬鴉老時，即電話聯絡了北蘇拉威西省領事保護機構派員迎送，從而保證我在彼處的人身安全。在沙灣岸古蹟遺址，感謝北蘇拉威西省華文教育協調機構主席徐啟忠先生在百忙中抽暇一路駕車陪同。米那哈撒族女生妮婭克服暈車和嘔吐，幫助我完成在莫達祥鎮（Modayang）杜嵩（Duson）村對民族成分及語言的調查，她的俏麗和堅韌，至今令人難以忘懷。最後還要提及內蒙古師大歷史系教授曹永年先生，感謝他給我仔細審稿和慰勉，並給予了充分肯定。內蒙古博物院陳永志院長亦在百忙中對實地踏勘圖片進行中肯的評判。

本文此前已經在河南的《尋根》雜誌發表一部分。其中被刪節的有三個部分，而這三個部分又非常地重要，計：一，刪去了提要；二，刪去了附篇；三，刪去了註釋，所以現在刊出的是詳盡的補充版本。此時此刻，當我在稿紙上落筆寫下最後的完稿日期時，我是懷着感恩的心，向所有幫助和支持過我的人們再說一聲，謝謝！

水上先民

註釋：

1. 趙振愚主編：《中外海戰大全》，北京：北京海潮出版社，1995年，第201頁。
2. [元]汪大淵：《島夷志略》，蘇繼傾校譯，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3. 元代右丞相，官一品，總理政務。蒙古人尚右，故以右丞相為長。
4. 征瓜哇兵士人數，史料記載互有抵牾。元代明善著《清河集》卷六《高興神道碑》則記“發兵七千人”。按當時的實際情況，可能皇帝下詔是兩萬人，而南方徵兵時只能徵集到的水軍數目是七千人。
5. 《元文類》卷四一，錢泰吉手校本，北京：北京國家圖書館閱覽室藏縮微膠片。
6. 《元史》卷二一〇，《外夷列傳·爪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7. 《元史》卷十三，《世祖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280頁。
8. 關於勾欄山今地考證，姚楠、蘇繼傾皆證Gelam此說。
9. [元]汪大淵：《島夷志略》，蘇繼傾校譯，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248頁。
10. 馬魯澗，殆指伊爾汗國最早的都城Maragha，今譯馬臘格，按姚楠考證，今地在伊朗西北部。證據見《島夷志略》，蘇繼傾校譯本。在所有宗藩汗國中，伊兒汗國的旭烈兀與忽必烈血緣關係最近，伊兒汗國自始至終都與元朝保持著密切的藩臣關係。
11. 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博士生色音在濟州島考察期間，曾見到幾位自稱是“大元”後裔的的牧馬人。他們自稱是蒙古人後裔，證據是家裡的族譜上“本貫”一欄均寫着“大元”二字。大約在1500年到1770年期間曾用過“大元”的姓，後來才逐漸出現趙、李等姓。他們在放馬的時候也經常唱些長調民謠，在他們中還流傳着好多有關蒙古人的傳說。詳見高娃：《南朝鮮的蒙古人後裔》，載《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1992年第2期。
12. 鄭隆：《略述內蒙古北部邊疆部分地區的石頭墓和石板墓》，載《內蒙古社會科學》1990年第1期。
13. 郝思德：《內蒙新巴爾虎右旗哈烏拉石板墓》，《北方文物》1988年04期。
14. 語出姚楠：《黃金地考證》一文，收錄於《古代南洋史地叢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44年，第108頁。該文云，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暹羅灣一座古城址發掘出一批戰死的蒙族人之遺骸，頭對西方。遺骸之枯掌中，尚握有鐵製武器之殘片。”筆者按：暹羅灣在南海西南部之馬來半島大部地區，此蒙族人之遺骸，殆為元軍征緬之餘部。“頭對西方”，緬於暹羅之西也，蓋謂元所部透西而東，落腳於此。
15. [法]賴內·格魯塞：《蒙古帝國史——活着就為征服世界》，“窩闊台加冕禮”，呂維斌譯，北京：中國出版集團，2016年12月。
16. 安泳鐸主編：《天驕遺寶——蒙元精品文物》，“阿八哈汗和他的子孫”，文物出版社，2011年9月。
17. 註引廖大珂：《從〈鄭和航海圖〉談中國人對澳洲的認識》，《鄭和下西洋研究文選（1905-2005）》，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第506頁。
18. 蓋山林：《內蒙古岩畫的文化解讀》，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第290頁。
19. 引自《藝文類聚》卷九六。
20. 烏蘭校勘：《元朝秘史》（校勘本），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21. 徐作生：《古蘇祿國西王府踏勘錄》，載廖建裕、柯木林、許福吉主編：《鄭和於亞非世界》，馬六甲博物館、國際鄭和學會聯合出版，2012年，第450-471頁。
22. 孔遠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文化探析》，香港：南島出版社，2000年。“圖騰崇拜”云，水牛或牛角是蘇門答臘故國的民族圖騰；虎豹是印尼南部巴比亞特氏族的原始圖騰；貓則是錫博士博士族（Sipospos）的圖騰；猿和山羊是錫勒加氏族（Siregar）的圖騰，等等。均未述及龍、太陽和蓮花。
2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主編：《呼倫貝爾民族考古文物大系——新巴爾虎左旗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20頁。
24. 孔遠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文化探析》，香港：南島出版社，2000年，第43頁。
25. [法]費琅：《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馮承鈞譯，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第39頁。